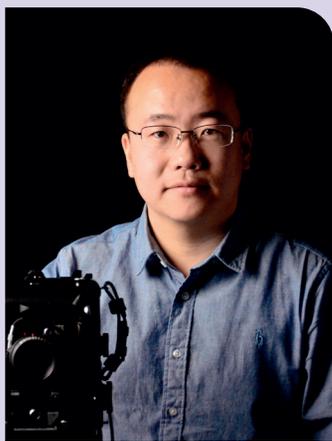


时代肖像： 中国最后的驯鹿部落

▶ 本刊记者 关悦



王伟，媒体人、摄影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摄影专业硕士。先后供职于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如同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的际遇一样，使鹿鄂温克人的独特文化，正无奈地在历史长河中静静消逝。

如果不是摄影师王伟历时 31 个月、行程 20000 余公里的考察调研、拍摄记录，最后一代的使鹿鄂温克人，将难以留下这些堪称民族影像史的珍贵肖像。

大兴安岭里的驯鹿人

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

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使鹿鄂温克人，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群体，历史上被称为“使鹿部”“雅库特”，是中国境内迄今唯一饲养驯鹿和保存“驯鹿文化”的民族。据有关民间传说的推演，使鹿鄂温克人已有近三千年的文化历史，他们是泛北极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口统计数量在 2001 年为——232 人。

千百年来，使鹿鄂温克人一直追随野生驯鹿游猎在外兴安岭和大兴安岭之间的原始山林地区。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领，一是追踪并驯养野生驯鹿，二是高超的狩猎术。他们吃兽肉、穿兽皮，住的是圆木杆支撑搭起的尖顶帐篷，外覆树皮或兽皮，称作“撮罗子”。

18 世纪，使鹿鄂温克人的先辈从俄罗斯外贝尔加尔湖流域和尼布楚河上游迁徙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上世纪中期开始定居在内蒙古东北部的原始森林腹地。从地图上看，这里几乎已经是中国雄鸡的鸡冠位置。大兴安岭给了使鹿鄂温克人世代赖以生存的丰富资源，也附赠了漫长而寒冷的冬季。

这里年平均温度零下 5 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50 摄氏度以下，可谓冰天雪地、人迹罕至。使鹿鄂温克人就在这里过着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生活。

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使鹿鄂温克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狩猎生产活动被限制。加之大兴安岭半个世纪以来因各种原因被过度砍伐，亟需休养生息，2001 年，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政府决定进行“生态移民”。2003 年，首批驯鹿鄂温克人和他们的驯鹿从大兴安岭腹地搬迁到了内蒙古根河市郊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新址。

但是，文明的进程与生态的消长总是相伴而生，交错而复杂。大森林里的驯鹿一直以原始森林深处最干净的苔藓和纯净无污染的水源为生，来到山下后，它们由于“水土不服”开始成批死亡。加之对突然迈进现代生活的不适应，一些使鹿鄂温克人又带着他们的鹿重新返回了大兴安岭的密林里。

来自盗猎者和野生动物的威胁、恶劣的生存环境、日渐没落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击……

虽然使鹿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位酋长——玛力亚·索老人说，大兴安岭的山林中只要有部落的老者和驯鹿在，就会有古老的驯鹿文明存在。但这一切，还是不可避免地渐渐成为落日的余晖。

34 幅肖像摄影，一个民族的影像

2013年，王伟作为媒体人受邀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采访拍摄。摄影师的职业敏感，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加上家乡的亲切（王伟是内蒙古人），让他禁不住想要进一步了解使鹿鄂温克人，产生了深入拍摄的念头。

摄影的创作方式有很多种，有旅行中的手机随手拍，有人文和自然风光交织的“大片”；有新闻报道摄影、也有纪实摄影。起初，王伟选择的是报道摄影的记录方式。但在与当地族人不断沟通、了解越来越深入的过程中，他渐渐觉得，不够！最后一代最具代表性的使鹿鄂温克人仅有30余人，世代赖以生存的驯鹿只剩800余头，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驯鹿文化、狩猎文化、桦树皮文化、萨满文化……正在逐步走向消亡。面对这样一种濒危的民族文化、面对这样一群有血有肉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挣扎拼搏的人们，他越来越迫切地希望能像他崇拜的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柯蒂斯记录北美印第安人那样，能真正



猎民古革军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中找寻走失的驯鹿。驯鹿依靠自然放养，白天驯鹿会结群到密林深处觅食苔藓，夜幕降临前会陆续返回“驯鹿点”，但时常会有驯鹿因意外无法返回的情况，这就需要使鹿鄂温克人凭借经验徒步去寻找。“寻鹿”的过程要面临很多未知的危险，如熊的出没，盗猎者设置的猎套。在艰难的处境下，部分使鹿鄂温克人至今依然坚守在山林之中。

“为一种在他看来即将消失的文化保留一份永恒的记忆”。

为了能真正成为当地人的朋友，用平行的视角而非旁观的角度去拍摄记录，他前前后后跑了二十多次。碰过无数的壁，也曾找向导时因为不知底细，被坏人逛到野外兜圈子，损失了所有的银子、废了好不容易攒的年假。但这条路，到底被他的韧劲儿硬生生打通了。他在当地交到了不少真正的朋友，再由朋友引荐陪伴，一家家去拜访拍摄对象，解释说明。

回想起拍摄的过程，王伟感慨“太难太难”。不断的变迁，使得

使鹿鄂温克人逐渐分散各处。有的选择守护传统，返回大兴安岭；有的则顺应时代潮流选择外出打工；有的已迁至外省，还有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人，静静地待在养老院里。30多位拍摄对象，每一位，从寻找，到沟通，慢慢等对方打开心扉，再到最后拍摄成功，都费尽千辛万苦。而这一路的故事，本身也成为了民族变迁的见证。

王伟的导师、同学曾劝他，这么艰难，不如就选用成熟的数码影像技术拍摄吧！不要在摄影技术上再难上加难了。但他仍是咬牙选择了极具挑战的大画幅相机和传统湿



猎民索玉兰在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定居点内制作“列巴”。由面和驯鹿奶制作的“列巴”是使鹿鄂温克人的传统主食。



猎民索宾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的驯鹿点用“鹿哨”召唤野鹿。这是使鹿部落内仅存的一只鹿哨。

版摄影技术。除了耗材和运输方面的巨大花费，由于大画幅相机操作的复杂性和湿版摄影感光材料的不确定性，因此拍摄对象稍有晃动，出来的片子就会虚化而不得不报废。而且面对极具存在感的大画幅相机，被摄对象要真正放下心防、愿意配合，才能成就一张自然而完美的照片。

最终，将近三年的时间，两万多公里行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持，成就了34幅足以载入民族影像史的肖像摄影作品。古典湿版摄影技术的加持，使得这些照片具有了仿佛可以凝结时光的厚重感，极具震撼力。

2020年10月，王伟的创作项目《使鹿鄂温克人》入选中国影像民族志摄影双年展，34幅珍贵的肖像作品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国民族报、中国摄影报、中国艺术报等国内外五十余家媒体对这一创作成果进行了采访和解读。

为即将消失的文化保留一份永恒的记忆

王伟越来越感到对少数民族濒危文化进行抢救性记录的迫切性。2018年拍摄完成至今，30多位拍摄对象中已有人因意外或疾病去世。山林中的驯鹿人家已经寥寥无几，下山的年轻人更多地选择了现代的

生活方式，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正在飞速地被遗忘。

他总是想起当地的一位老人，也是一位使鹿鄂温克的非遗传承人。打开心扉成了朋友后，老人感慨“难得现在的年轻人还愿意这样吃苦做事”，对着他打开了轻易不示人的柜子。那里面，满满的都是老人多年来积攒的音频、视频资料，还有手写的几十万字民族历史和故事。王伟感慨地说，等再过几年老人去世，不知还有谁能解读这些珍贵的民族史料？……

现在，王伟对使鹿鄂温克人的抢救性拍摄仍在继续。未来几年，他打算将镜头对准新时代的使鹿鄂温克人，记录他们鲜活的生活、他们遇到的困惑、矛盾，以及文化的融合与冲击。

“我还想更多地接触这个民族，去记录它的变迁，用动态和静态影像结合的方式去抢救性地记录他们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王伟说。

摄影作品在多地展出后，有企业家慕名找到王伟，想买下来挂在自己的商业空间。但王伟觉得，对方并没有真正在民族文化保护的层面和自己达成共识。所以，虽然前期拍摄花了几十万后亟需下一步的启动资金，他还是婉拒了对方。他说，希望找到真正愿意一起保护使鹿部落文化的人。也诚挚希望有能力的校友共同加入。他说，我会争取一切力量，把这件事做下去。📷



猎民达瓦在大兴安岭腹地的定居点附近取水。五月份的大兴安岭，冰雪尚未消融。使鹿鄂温克人的迁徙常以驯鹿食用的苔藓丰富、群山环抱、河流分布的地区为选择条件。



猎民古革军在大兴安岭腹地与驯鹿在一起。使鹿鄂温克人在放下猎枪后，深山里牧养的驯鹿常常要面对熊、猞猁和盗猎者的威胁，驯鹿的繁衍生息面临极大困境。



玛力亚·索，生于1921年。实施整体生态移民后，90余岁高龄的玛力亚·索仍然坚守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之中，带领着孩子和部分族人们饲养并发展着中国境内唯一的驯鹿种群，是部落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玛尼，生于1950年。小学毕业后的玛尼被保送至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80年9月，玛尼当选为民族乡副乡长，是仅有的几名使鹿鄂温克民族女干部之一。



柳霞，生于1963年。从小随父辈狩猎，跟随母亲饲养驯鹿学习民族传统技艺。在接受短暂的学业后，柳霞又重返山林，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牧养驯鹿至今。



安塔·布，生于1944年。从小就随父母学会了狩猎和饲养驯鹿技能，12岁开始独自在山林中放养驯鹿。她制作的鄂温克族传统鹿皮靴子、手套、鹿皮大衣等被海外多家博物馆收藏。



达瓦，生于1965年。达瓦从小随父辈狩猎，小学毕业后的他重返山林，依靠牧养驯鹿生活至今。目前，达瓦牧养的驯鹿种群近两百头，是民族乡中拥有驯鹿最多的一户。



布冬霞，生于1976年。从小在山林里长大，有着较强的狩猎和驯鹿饲养技能，高中毕业后选择重返山林，在深山密林中牧养驯鹿并发展旅游业。

（本文照片由王伟拍摄并提供）